**政治系统信任对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

温莹莹 朱萌 张亮

**一、引言**

马歇尔·伯曼曾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危险的经验： “要成为现代的，就是要在一种允许我们去冒险、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改变自我和世界的环境——与此同时，这也可能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的一切以及我们现在成为的一切”（伯曼，2013:15），即在现代性的世界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比如原有亲密无间的社会关系或美好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的毁坏或许是人类社会在现代性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之一。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何平衡好发展与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学界反思现代性的重要议题。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使得中国也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与复杂的环境问题。探讨环境污染的原因、如何开展有效的环境治理以及环境保护意识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等问题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的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中国在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中面临着“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曾婧婧等，2015；卢春天等，2020）：地方政府官员为谋求政绩而忽视环境保护的公共职责，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由此导致市场环保标准持续下降，引发“竞次效应（Race to Bottom）”（Venbles AJ，Markusen JR，1999）。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导致社会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或过于依赖政府作为，或选择搭便车，最终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参与度相对较低（王玉君、韩冬临，2016；卢春天等，2020）。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依靠政府治理，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治理中存在社会“缺席”问题（包智明，陈占江，2011）。因此，研究公众环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公众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环保意识/意愿”和“环保行为”两个主题上。已有研究关注公众环保意识的比较多，而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实证研究相对薄弱（周志家，2011；洪大用、卢春天，2011）。早期的研究将人们的环保意识/意愿等同于环保行为，然而，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公众在表达环境保护意愿方面较为积极，但却较少落实在环保行动上（Harrys，2008）。显然，环保意愿与环保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新近的研究也表明，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升，且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践行较好，但在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却出现了逐年下降趋势（王玉君、韩冬临，2016）。总之，公众的环保行为是多元且复杂的，其具体的影响因素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已有理论将人们的环保行为作了不同区分，如斯特恩区分了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公共领域激进的环保行为与公共领域非激进的环保行为（Stern, 2000）；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行为（Hunter, 2004）、环境激进行为和环境友好行为（Tindall, 2003）以及环境政治性行为和环境保护性行为（Dalton, 2015）。借鉴斯特恩与亨特等人的区分，我们将公众的环保行为主要区分为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行为。本项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城乡居民在公共领域的环保行为，简称公共环保行为。

**二、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

纵观已有研究，以往关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影响因素。

**（一）宏观层面影响因素**

宏观层次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公众环保行为的显著影响。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与环保行为。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关注环保行为，主要是根据狄克曼和弗兰真于1999年提出的经济发展富裕假说（Diekmann A., Franzen A., 1999）。这个假说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发展将会促进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一方面，经济发展将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因为环境质量是高收入人群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将导致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将使得人们为改善环境质量投入更多支出提供了可能性，即经济发展与人们的环保行为呈正相关关系。部分实证研究论证了富裕假说，如道尔顿的研究论证了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公众的环境政治性活动和保护性行为（Dalton, 2015）；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发现，王玉君等人的研究论证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公众的私人和公共环保行为（王玉君、韩冬临，2016；王晓楠、刘琳，2017）。然而，也有不少学者对富裕假说提出质疑，邓拉普等人就认为，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遍及全球，并不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与发达国家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公众也具有很高的环保意识（Dunlap, R.E., and A.G.Mertig., 1995）。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民众更关心环保问题（Dunlap, R.E., York R., 2008）。还有学者运用中国、美国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经济因素对公众各项公共环保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卢春天等，2020）。

其次，环境污染与环保行为。根据英格尔哈特的客观问题假说，环境污染与环保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形成了环境污染驱动假说。英格尔哈特对世界价值观调查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污染越严重的国家，其公众越关心环境问题，对环境保护的支持也越强烈，即环境污染严重，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驱动其采取各种环保行为（R.Inglehart, 1995）。其他跨国调查数据也支持了环境污染驱动假说(S.T.Marquart-Pyatt, 2007)。不过，环境污染情况与公众的环保行为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关系。有些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质量会影响公众的公共环保行为（Freymeyer, R.H.，and B.E.Johnson. , 2010），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环境质量并不会对公众的环境观念产生影响（Franzen, A.，and R.Meyer., 2010）。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未能支持全部的环境污染假说，有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会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关心（王焱，2016），但并无直接的证据表明环境污染会驱动人们采取环保行为。

最后，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交互作用与环保行为。在富裕假说和环境污染驱动假说的启发下，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宏观层面也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及其两者交互作用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单纯环境污染并不显著影响公众的环保行为，但在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下，对人们的环保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王玉君、韩冬临，2016；王晓楠、刘琳，2017；卢春天等，2020）。

**（二）微观层面影响因素**

从微观层面探讨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人口要素、社会经济地位、信息获取、政治参与、政府信任以及价值规范等因素。由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种假设：

第一，个体因素假设。关于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个体因素，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要素。除此，国内学者还关注户口类别、政治面貌等对人们环境行为的可能影响。但研究结果难以达成一致。如许多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环境关心（McStay, J.R.& R.E.Dunlap., 1983），但也有支持男性的环境关心程度高于女性的研究结果(Arcury,T.A.&E.Christianson, 1984)。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矛盾的结论，如彭远春等人的研究认为女性具有更多的环境行为（彭远春，2015；王玉君、韩冬临，2016），而洪大用等人的研究结果却相反（洪大用、肖晨阳，2007；洪大用、卢春天，2011；王晓楠、刘琳，2017）。实证研究关于年龄对人们环保行为的影响结果也未能达成一致，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具有更多的环保行为（王玉君、韩冬临，2016），另一些研究得出相反结论（彭远春，2015；王晓楠、刘林，2017）。个体因素中还有婚姻假设与政治取向假设，婚姻假设认为环境行为受家庭类型的影响（Gatersleben B.Steg L.,Vlek C., 2002），政治取向假设认为民主党或自由主义者比共和党或保守党具有更多的环境关心（Dunlap, Riley E and Van Liere, K D., 1978）。

第二，社会经济地位假设。社会经济地位一般关注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指标。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认为，不论是个体的客观还是自身阶层归属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水平，都与其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呈正相关，这一假设得到了早期研究（Butel, F.H.& W.L.Flinn., 1974）和近期研究（彭远春，2013；王玉君、韩冬临，2016；王晓楠、刘琳，2017；卢春天等，2020）的证实。

第三，信息获取假设。信息获取假设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媒体使用情况。国内外相关研究一致认为公众的环境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信息获取和媒体使用情况的显著影响。已有研究发现，信息获取的途径多、媒体使用的频率高以及获取信息能力强能显著促进人们的环境行为（彭远春，2013；范叶超、洪大用，2015；沈珺，2017；聂伟、梁婷婷，2019；卢春天等，2020）。已有研究也发现，媒体使用对人们的环保行为并非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增加人们的环境知识、环境问题感知以及相关风险的认知发挥作用（周全、汤书昆，2017；孙明源、王锡苓，2018）。

在信息化时代，公众主要依靠媒体获取信息和分享观点。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为代表传统媒体和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是人们获取环境信息的重要来源。人们通过媒体使用了解到环境问题的现状、提升对环境问题和认知等。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的建构主义范式成为社会学环境研究的主要范式。其中，媒体使用对环境议题的建构尤为突出。由于许多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环境问题，存在于普通公众的直接经验之外，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由于其专业性特点而不能被普通大众直接了解和认识。许多环境问题正是通过媒体的专业报道，才能为人们所知和讨论。汉尼根认为，媒体在环境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教育者和议程设置中介人的作用，媒体通过建构将环境议题嵌入到媒体化背景下公众的认知系统里（汉尼根，2009）。由此，本研究将把信息获取媒体使用作为重要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和考察。

第四、价值规范假设。这一假设认为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深受个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信念等的影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后物质主义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后物质主义假说最早由美国学者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提出，他认为当社会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会开始更多地关注非物质层面的需求，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就是其中之一。个人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是在社会富裕后基本价值观念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的结果（英格尔哈特，2013）。后物质主义理论在理论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验证。许多经验研究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里了的解释力并不显著或者偏弱（肖晨阳、陈涛，2020；卢春天等，2020）。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是由迪茨团队提出，他们认为个体的基础价值观、环境认知、责任归属等信念和行为规范将影响个体实际的环境行为。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尤其关注利他主义、包容性等价值观，根据理论观点，利他主义和包容性价值观将更容易接纳和培养出环境友好的世界观，促使个体认识环境问题的危害和接受环境改善的个人责任，这些都会导致环境友好的个人行为规范，最终促进个体的环境行为。相反，利己主义和排他性的价值观会导致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缺位，从而加剧环境问题(Dietz et al.,1999)。

第五、政治参与、政府信任假设。邓拉普等人早期研究环境问题时曾提出环境制度改革需要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Dunlap, Riley E and Van Liere, K D., 1978）。持这一假说的学者认为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公众在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将带来更多的环境行为（王晓楠、刘琳，2017）。在环境问题的相关理论中并未明确提出政府信任假设，但近年来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政府信任与环境关心、环保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论证了政府信任对公众的环保行为确实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池上新等，2017；卢春天等，2020）。

**三、政治系统信任与环保行为**

环境社会学相关研究分别从经济、环境污染等宏观层面和个体微观层面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作了许多有益探索。国内相关经验研究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公众环保行为问题，涵盖了以上提及的宏观、微观层面的大部分影响因素。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关注环保意识较多，研究环保行为的相对较少。同时，关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验证了经济发展富裕假说、环境污染驱动假说以及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假说、信息获取假说、价值信念规范假说、政府信任假说等，但个体的政治系统信任假说在中国还未得到经验研究的充分支持，鲜有经验研究对其进行论证。基于此，本项研究将重点关注个体的政治系统信任是否会影响其环保行为。

吉登斯将信任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 技术性知识) 之正确的信念。”(Giddens，1991) 这一界定实际上将信任划分为了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两个维度。吉登斯认为，随着人们交往方式由“熟人”到“陌生人”、由“在场”到“缺场”的转变，社会互动的脱域性质的不断加剧，传统上以熟悉、简单社会互动和共享文化密码为基础的人际信任逐渐向“系统信任”过渡。可以说，现代社会“脱域”背景下的信任本质上就是由“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构成的系统信任，前者是对类似于货币、股票等媒介标志的信任，后者表现为对医生、教师、计算机专家的信任(Giddens，1991) 。卢曼在区分危险与风险的基础上，将信任与风险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由功能分化所导致的系统复杂性剧增引起的，信任则是现代社会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简化机制。“系统信任”是一种超越了传统人格信任的新形式的信任体系，它涉及的是具体的个人与抽象对象之间非具体化的信任关系，具有凝固性、普泛性、非动机性、规范性。其中，抽象对象包括专家系统、象征符号、规则制度、专业性和政府机构等（Luhmann，1979）。在此理论关照下，现代社会的信任与风险其实是相互交织的，人们通过对系统的信任以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社会风险的不断加剧也在使公众形成一种结构性依赖，他们期望并依靠系统提供安全保障（Beck，1986；Ali，1997）。但另一方面，系统世界的过度扩张预示着市场机制和科层化权力向公众生活世界“殖民”的危险（Habermas，1929），抽象系统在风险管理中表现出的“失能”（recreancy）可能引发公众信任危机和对系统合法性的质疑(Freudenberg，1993；Habermas，1973）。在环境研究领域，有学者结合帕森斯对社会系统的分类，将系统信任操作化为市场信任、政府信任、专家信任、媒体信任四个指标，发现市场信任与政府信任是影响中国公众面对风险反应的重要因素，对多重系统的不信任可能激发公众的抗争性行为（龚文娟；2023）。

以上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系统信任对人们的公共环保行为可能存在显著影响。首先，环保社会学理论中强调了个体的价值规范信念等将影响其实际的环保行为（M. M. Bell and L.Ashwood, 2015），而系统信任正是作为重要的风险社会信念之一；其次，系统信任涉及具体个人对抽象对象之间的信任，通过对系统的信任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如环境破坏带来的风险等；最后，环境质量具有纯公共物品的属性，促进公共环保行为实际上是如何增进个体在集体行动（公共环保行为）中的合作和公共参与问题。在集体行动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中，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已被充分论证了其对克服搭便车等集体行动困境的积极影响，各种形式的信任可以诱导互惠合作，个体将更易于在集体行动进行合作，尽力避免与克服搭便车行为（帕特南，2012）。系统信任是现代社会中信任的重要内容，本文将聚焦对更具体的政治系统信任的考察。

基于此，我们提出本项研究的主要假设：政治系统信任对个体的公共环保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结合以往研究的各种假设，我们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公共环保行为**

个体因素假说（控制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假说

价值信念规范假说

政治参与、政府信任假说

**信息获取假说（媒体使用）**

**政治系统信任假说**

**图1研究框架：政治系统信任对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媒体使用的中介效应**